

近日笔者跟体制内的亲戚长谈了中日关系的热点问题。他对日本的认识很能体现中国一般民众近年来对日本的观感，很有代表性。根据笔者两年的留日经历和作为一个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观察，这些对日认识很多时候并不符合客观事实，而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做出的决策，甚至可能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 错误认识一：

#### 日本人是全世界最低劣的民族

日本一些政府人士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难以接受，日本民间的右翼分子也发表了许多相当不负责任的言论。例如他们在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的表态。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抵制。但如果把右翼分子的举动归因于民族的特性，即所谓的“民族性”，在因果推断上就犯了逻辑的错误。

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科学家基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所谓的“民族性”对某一群体行为的解释力相当有限——“民族性”是相对固定的，但国家的行为却千变万化，我们又如何能用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去解释变化多端的行为？

用所谓的“民族性”去对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行为进行批判，对象不仅仅是日本，更包括中国自己。例如，当年梁启超就认为中国人愚昧、落后、散漫、缺乏集体互助精神。但是，就是其笔下有着愚昧、落后“民族性”的中国人，今天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甚至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 以日为师尚未过时

尹伟文

这意味着，要么中国的“民族性”彻底改变了，要么所谓的“民族性”根本不能说明什么。同理，我们在了解日本人这个民族的时候，也不应过分迷信“民族性”的解释力，而应该多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寻找原因。

### 错误认识二：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辟、迟早再次走上对外扩张之路

这种观点在许多中国民众当中也非常普遍，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安倍所代表的只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后者一直面临着更为强大的日本左翼的制衡。如果我们能关注一下多年以来日本民众（特别是冲绳地区民众）的保卫和平宪法运动以及近日的反安保法示威，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日本是一个成熟而多元的现代民主国家，日本人甚至可以公开表示钓鱼岛并非日本的固有领土。右翼势力再猖獗，也不可能轻易占据舆论主导权（当然，近日安倍政权介入媒体、打压舆论事件值得日本民众和知识界警惕）。

那么，如果日本真的成为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家，我们又如何解释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一系列的“国家正常化”措施呢？又如何能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举措能得到相当一部分的日本选民的支持呢？既然我们不能从“民族性”里寻找原因，我们就得把目光投向社会性因素，设身处地站在日本的角度进行考量。“国家正常化”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不久，

但之所以能在最近几年突飞猛进，从时间关系上看，跟2010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更加自信武断（assertive）有着密切关系。

也就是说，日本的军备扩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外交行为的反应，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更不应该误判形势。其实，对意欲通过安保法案的安倍政权而言，最大的制约力量正是主张维护和平宪法的民众。正如日本学者天儿慧所说，如果中国继续强化对日强硬政策，将会给予安倍在日本国民心中坐实“中国威胁论”的机会，对于安倍政权不是减分是加分。

### 错误认识三：中日早晚必有一战

这也是相当普遍的一种观点（类似的主张还包括中美必有一战）。中日之间确实存在在东海、甚至在南中国海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但为了追求更大权力、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战争是不是最优的手段呢？《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篇》）。”孙子提醒我们，正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才应该慎之又慎地对待战争这一手段。

中日、中美之间将会长期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高屋建瓴地指出，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是经济和技术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非“早打、大打、打核战

争”。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也认为“中日必有一战”将是一场“创新之战”。如果中国不能抓紧机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在环保、能源、食品、医疗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的创新，切实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反而把过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零和的军备竞赛中，中国就会输掉这场没有硝烟的“创新之战”。前苏联赢得了军备竞赛，却输掉了更关键的“创新之战”，前车可鉴啊！

如果上述的三种认识都有偏颇之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日本、如何跟日本这个“剪不断理还乱”邻国打交道呢？笔者认为，21世纪的中国，应该继续以日为师，同时尝试以日为友。

自甲午战争彻底粉碎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以来，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纷纷奔赴日本，希望能通过日本了解西方的现代知识。孙中山、黄兴、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蒋介石、胡汉民……都有过留日经历。如果说当年学习日本是为了寻找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短时间内实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法宝，今天学习日本，则主要是为了了解日本在二战以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最为棘手的环境污染、经济泡沫和人口老龄化，都是日本在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就面临的问题。可见，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国情跟中国更加相似，因此日本的经验更

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尽管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是日本的两倍，但在细节方面学习日本对我们还是非常有益的。

除了继续以日为师，中国还可以考虑以日为友。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其经典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说过，美国之所以能维持霸权国地位，并非因为美国掌握了全球霸权，而是因为美国能成功地防止任何一个大国成为地区霸权，具体方法是通过拉拢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实现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因此，中国要应对美国的打压一面，就很有必要通过外交手段团结亚洲邻国，而非单纯地宣示武力。

要迈出这一步，我们就应该打开思路，摒弃意气用事，不拘泥细枝末节，拿出1970年代毛泽东主动跟被妖魔化的对手——“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接触的智慧 and 勇气来，打开区域外交的新局面。总而言之，国际关系首先是一种利益关系，而国家利益不是靠我们自认为赢得道德的高地就能去实现的。

“妖魔化”日本不仅仅是放弃客观思考的表现，还会直接促成美日的国际反华“统一战线”，以及日本国内的右翼反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首，也是中国1970年以来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关键，但今天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时候，却把百试不爽的法宝抛诸脑后，最终受损的恐怕还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助理